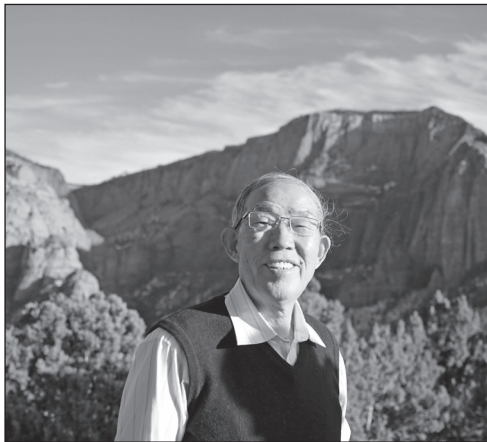


母校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 陈善科（1968届工物）



陈善科学长近影

1961年9月初，我这个来自华蓥山下的乡巴佬成为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的一名学生。戴上白底红字的清华大学校徽，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和自豪。

我被分在物703班，住5号楼，同宿舍的还有李裕熊、崔宝明、倪彼得、卜永熙、杨宏德5人，分别来自北京、上海、江苏、福建和四川。大家对学习都抓得特别紧，也很注意锻炼身体，每天下午4:00后都到操场跑步、打球。由于我上大学前身体就很差，骨瘦如柴，一米六几的身高，体重只有77斤。加之天气变冷，水土不服，学习紧张，没多久脸上、腿上就开始有些浮肿。同学们说我长胖了，我自己知道情况不妙，立即注意休息，争取让浮肿自动消失。没想到，情况

越来越严重，只好到校医院看病。

医生很有经验，用手轻轻在脚上一按就是一个深坑，很长时间都恢复不过来。他让我马上住院治疗，主要是休息和加强营养。医生给我发了一包炒熟的黄豆面，早餐偶尔有豆浆或牛奶，这在当时可是最好的营养品了。住院期间还查出我患有钩虫病，吃了驱虫药后，天旋地转，好像是坐在火车上，耳边发出轰隆隆、轰隆隆的响声，昏昏沉沉的，不知睡了多长时间才醒过来。

班主任老师、政治辅导员和班干部都到医院来看望我。住了一个多月后，浮肿完全消失，身体也长胖了一些，考虑到落下的功课太多，已接近期末，我心里很着急，于是要求出院。医生很理解我的心情，也就同意了。但出院后不到两个星期又有些浮肿，政治辅导员牛树盈将此情况告诉系里，系里研究后决定让我休学，但我坚决不同意休学。牛树盈反复做我的思想工作：这是为你的身体长远着想，回家养好身体后再来上学不更好嘛！

系里的好意我当然理解，但家乡的困难情境就在眼前：父亲和我大哥的小女儿都得浮肿病去世了，村里还死了一些人。母亲和大哥在生产大队的浮肿病医院住了很久，身体至今非常虚弱。么爸（我父亲的弟弟）家住邻村，饿得实

在受不了出去要饭，至今一年多杳无音信。虽然全国经济形势已经开始好转，但四川仍特别困难，今年暑假，县里数所中学都停办了，不到万不得已学校是不会停办的。我如果这时休学回到农村，连口粮都没有，怎么生活下去？再说，除坐车坐船外，还要挑着行李走60里山路才能到家，我现在的身体状况是难以承受的。因此，休学回家很可能是死路一条，即使不死，恐怕再也不能到北京来上学了。

怎么办？家乡的困难情况要不要如实告诉辅导员？讲吧，有可能被批判成对三面红旗不满，反党反社会主义。我高中就读的江北二中学生会主席王××，家庭出身好，各方面都很优秀，因为和几个同学一起说了些对经济困难不满的话，不仅被批判，取消毕业和高考资格，还被开除学籍、团籍，回农村劳动改造。不讲吧，休学回家的后果不堪设想。讲与不讲，都是绝路一条，经过反复考虑，决定把老家的困难情况如实告诉牛树盈。

听了我的介绍，牛树盈同志对此深表同情和理解，并向系里作了详细汇报。系里又请示了校党委副书记兼系主任何东昌，不仅没有批判我，还决定让我休学后仍住在学生宿舍，继续享受每月16.5元的最高助学金，并发给棉帽、棉鞋和棉手套等御寒用品，还将我从朝北的宿舍换到朝南的宿舍。

在我人生最困难的时候，是清华大学给予我慈母般的关怀和爱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救了我的命。那时每月伙食费是12.5元，扣除后还有4元零花钱，可以用来买文具、配眼镜（中学时我就

近视，但一直没有钱配）和购置日常用品，因此，生活、学习都有了经济保障，解决了我的后顾之忧。同宿舍的石定寰、唐炯然、周梦君、孙维藩、于敬文同学也给予我很多帮助，一起锻炼，一起游玩，心情非常愉快，没过多久浮肿就完全消了，人长胖了，个子长高了，身体好多了。1962年8月体检，我的体重从入学时的77斤增加到100多斤，血色素等指标都达到正常水平。因此，休学半年多我就复学了，分在物805班，从此成为物八这个团结、友爱集体的一员。

我常想，我若在其他大学，结果会是怎样难以预料。若是在四川上大学，十有八九要挨批判，甚至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开除学籍。时任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兼市团委书记的廖伯康同志，在1962年参加团中央会议期间，向中央领导反映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四川饿死人的真相，后来被当时的省委领导知道了，便将他打成反党分子，长期遭受迫害，直至1982年才平反。前面提到的高中同学王××，回农村后，历次运动中都挨整、被批斗。文革结束后虽然给平了反，但大好的青春年华已一去不复返，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在大讲特讲阶级斗争、极左路线盛行的情况下，清华大学党委和工物系党总支仍能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是非常不容易的。

清华大学，我敬爱的母校，我永远感谢您的救命之恩，感谢您的教育和培养！同时，还要感谢物703班的班主任和同学们，感谢当年的政治辅导员牛树盈同志，感谢系主任何东昌和系里的老师们！没有他们，就没有我的今天。清华恩情，终生不忘！